

教育部一直想解决择校费问题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择校问题已成为影响教育公平发展的“顽疾”。为此,教育部一直在致力于治本之策,就是走扩大优质资源,走均衡发展之路。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院长涂艳国如是说:“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择校问题,实现均衡发展,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解决择校费问题要正本清源

现在怎么办?恐怕还得从实际出发。“择校和均衡不是分立而行,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策略地交织在一起,基础教育均衡化,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是政府行为。”

杭州市春芽实验学校校长刘晋斌说。

为了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教育部2005年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把今后义务教育工作的重心进一步落实到办好每一所学校和关注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上来,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

《广州市教育经费投入与管理条例》规定,市人民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

当不低于15%;区、县级市年度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定。捐资助学费作为财政预算外收入,可作为财政对教育的部分投入,客观上起到了缓解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压力的作用。

一位专家建议,应由地方人大着眼于民生大计发挥监督职能。一方面,监督政府扶持薄弱学校,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审核优势学校择校生比例,监督择校费必须流向薄弱学校。同时,由审计部门定期对择校费审计。在他看来,一旦利益链条被斩断,有关部门、学校收取择校费的动力荡然无存,择校费也就回归调节功能的本位。

政府要正本清源地通过弥补这些失职来消除新的不公,而不能依赖本已不公的择校费。

上述教育界人士说,在保证充足的义务教育经费的同时,教师和校长由政府机构进行轮换调整,保证各校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的相对均衡。

均衡教育的核心是实现师资均衡

“义乌已经开始了教育均衡的尝试。”楼曙光说。

楼曙光在义乌市上溪镇溪华小学当了三年校长,这是浙江义乌最基层的一个普通完小,“属

于义乌的偏远山区学校”。

为了促进教育均衡,义乌市教育局把他从义乌最好的浙江义乌实验小学副校长任上,调到了这里。

“义乌想在区域教育均衡方面作努力。”三年基层校长带给他的经验是,“教育均衡真正有作用的是师资”。

义乌的环境比较好,学校配置基本上都已经到位,城乡硬件设施差异不大。也有一部分老师下到农村里去,但是这些实际上所做的东西还是太少,一年根本没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我觉得步子还是太小,真正做到教育均衡还有帮很多路要走。”楼曙光说。

农村好老师都往城里跑,农村学校里培养好了一个就走一个。所以教育界人士一致认为,教育均衡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师的平衡。教师的轮换制度是政府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措施之一。

教育部和各省都要求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校长、教师定期流动机制。按照优质校与薄弱校教师定期互派轮岗的制度,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还是能得到充分发挥。

校长流动机制实现应该不难,但是,实现教

师资源的均衡分配可能吗?学者们认为,没有物质资源的均衡化,没有激励机制的实施,教师资源的均衡分配只能是一句空话!

怎样让老师流动起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的观点是,一个办法就是把教师变为公务员。其实欧洲、日本的教师都是公务员。既然是公务员,享受国家的相关待遇,那么就承担义务,就是5年一轮岗,在城市工作5年,就要到农村去工作5年。当然教师变公务员,也不是说一下子把所有教师都转为公务员,而是先把部分教师比如新上岗的青年教师和优秀教师变为公务员,让他们流动起来,这样逐渐增加中小学教师公务员的数量。

据了解,日本公立学校,教师都享受全国统一的公务员待遇,实行校长“任期制”和“轮岗制”。同样教师也实行定期流动,一般说来在6年内都会流动一次,这对均衡发展水平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经济薄弱的地区,作用更为显著。由于师资均衡,在日本这么一个人口密集、各种竞争也极其激烈的国家,并无择校的狂热。

摘自《南方周末》

有些话,说得顺理成章,理直气壮。
“我没有时间。”
“我赶不及。”
“要开会。”
“不,真的挤不出空当。”
“怕妨碍了你。”
“世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也没有‘找不到’的人。”
“没空当”,是相比之

挡的是不来的人

我是1955年出生的,以下是我活到现在亲身经历的几次经济泡沫。

1987年香港股灾:从千万富翁到街边小贩

1986年,我在深圳见到了十几年未见的小学老师。他是在长春市安远路小学读书的语文和数学老师,1977年他带着老婆,孩子来到香港。老师从建筑工人开始,几年后开始在家里装电子表往大陆卖,后来深圳开放了,他跑到深圳办了手錶。

在深圳第一次见面,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深圳(香港)环亚电子集团公司董事长,他在深圳的工厂有1000多工人,是深圳当时最大的电子装配工厂之一。之后三年,我们没再联系。1990年我在香港油麻地逛街,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十元两件!十元两件!”我回头,有些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的老师正站在三轮车大声叫卖日本的手表衣服。怕他尴尬,更怕自己尴尬,我没敢去跟他打招呼。

回家后,连忙找出名片给老师打电话,所有电话都变成别人的了。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油麻地,那天没有市清,我鼓着勇气上前跟老师打招呼,本以为他会尴尬,可老师似乎并不在乎,他坦率地说:“我破产了,现在只能做这个生意了。见到你真好,如果没事,陪我聊聊天。”我问:“那么大的工厂,怎么会破产?”老师说:“嗨!都是一个贪字。1986年香港股市疯了,我看不少人赚钱,我这个学金融的虽然知道股市风险大,但还是忍不住进去了,结果越炒越

大,最多一天能赚一千万,我把工厂也抵押给银行,借了钱去炒股,哪承想1987年股灾一来,我的资金一下子转不动,房子和工厂都给银行拿走了。”我问:“师母怎么样?”她现在在新加坡的一件制衣厂剪线头,我们还借了一部分私人的钱,这个钱总是要还的。好在这是香港,人只要勤劳就饿不死;只要饿不死,总会有机会。这就是人生。”当时已快要60岁的老师这样说。

老师永远是老师。从此我明白香港人说的“马死落地行”是什么意思了。

那次股灾,起源于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此前一天,美国股市大跌22%,与美国关系密切的香港股市,随即一跟头栽倒。股市暴跌,港府只好出手,连关了四天市,港股重新开张,多数股民的钱亏损了2/3。有一大批香港股民像我的老师一样破了产,其中大部分人永远也没机会再回到股市。

1992年日本股灾:跳楼的野村证券员工

1990年,我到日本公出,顺便去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参观。当时的日本股市如日中天,比2007年的中国股市还火,市盈率甚至冲到了100倍,一些日本和世界经济学家纷纷说,传统经济理论对日本不适用,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那一年,日本房地产业同样不可一世,据说整个东京市的地价、房产总值,甚至可以买回半个美国。那时候,日本商人在全

世界可牛了,到哪儿都像阔佬逛菜市场一样,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于是,日本人买了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厦,买了美国电影的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买了加拿大的森林,买了澳洲的铁矿,买了香港山上最贵的房子,日本女人买了70%法国生产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群结队飞去泰国打高尔夫,顺带高价买春……接待我的是一位野村证券的年轻经理,他把我送出野村大楼时,站在大厦旁边台阶上,指着那座摇摇欲坠的60多层的花岗岩大厦不无骄傲地说:“当今世界已无人能挑战这个楼盘开盘卖楼花,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队。可房子还没住进去,泡沫就来了。楼价一口气跌了2/3。一位刚来香港还不大懂香港规矩的内地歌星火急火燎地找到我,说是要退房,我说:‘不知怎么回事,到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33000点跌到了11000点。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日本企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了一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好几家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证券经理到香港出差,我请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诉我:现在日本企业也开始裁员了,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证券界,他手下一个前年才从早稻田毕业的青年,上个月跳楼了。电视台现在最热门的电

视节目就是教人如何省钱,比如教日本家庭主妇如何用烧饭的余热煮鸡蛋。

那段时间,香港大街上的日本游客少了,进高档餐馆吃饭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经济泡沫”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脑海里有了真实感受。从此,这泡沫就经常跟着我了。

1997年香港股灾:成为负资产的女秘书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了,香港哀声一片。

本来,1997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还挺好的,香港的楼市,股市不断创下新高,去酒楼吃饭至少要排队。我们公司开发的几个楼盘开盘卖楼花,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队。可房子还没住进去,泡沫就来了。楼价一口气跌了2/3。一位刚来香港还不大懂香港规矩的内地歌星火急火燎地找到我,说是要退房,我说:‘不知怎么回事,到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33000点跌到了11000点。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日本企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了一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好几家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证券经理到香港出差,我请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诉我:现在日本企业也开始裁员了,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证券界,他手下一个前年才从早稻田毕业的青年,上个月跳楼了。电视台现在最热门的电

视节目就是教人如何省钱,比如教日本家庭主妇如何用烧饭的余热煮鸡蛋。那段时间,香港大街上的日本游客少了,进高档餐馆吃饭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经济泡沫”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脑海里有了真实感受。从此,这泡沫就经常跟着我了。

1997年香港股灾,亚洲金融风暴来了,香港哀声一片。本来,1997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还挺好的,香港的楼市,股市不断创下新高,去酒楼吃饭至少要排队。我们公司开发的几个楼盘开盘卖楼花,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队。可房子还没住进去,泡沫就来了。楼价一口气跌了2/3。一位刚来香港还不大懂香港规矩的内地歌星火急火燎地找到我,说是要退房,我说:‘不知怎么回事,到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33000点跌到了11000点。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日本企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了一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好几家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摘自《中国企业家人》

乘着苦难的翅膀飞翔

李明博

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母亲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搬到首尔照顾二哥。我和妹妹因为要读高中,只能暂时留在浦项。父母为了筹措在首尔的生活费,把房子和做买卖的用具都卖了,只给我和妹妹准备了一间很小的房间。我们俩一边读书,一边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父母每个月寄来的伙食费根本不够我们吃饱,天天喝稀粥也很难维持一个月。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央求我:“哥哥,咱们哪怕前十天吃个饱,后二十天饿肚子也行啊。”但我知道如果那样做,我们俩一定会饿死。我找来30个纸袋子,把一天的粮食分成30份,一天就拿出一份,让妹妹去煮粥。直到现在,妹妹见到我还总是苦笑着说:“哥哥当时真残酷,我差点离家出走。”

1959年12月,我和妹

妹终于踏上了开往首尔的火车。一路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孤独与迷惘。离开了艰难生活了14年的浦项,从今后后,陌生的首尔又将抛给我怎样的面貌?父母似乎还没有在首尔安定下来,贫穷开始纠缠不休。但是,我心里还总期待着首尔能有和浦项不一样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父母在梨泰院的棚户区租了一间小屋子,每天到市场上卖蔬菜,和在浦项时没什么两样。我那时没钱做买卖,倒是难得地清闲起来。我曾经坐着电车,从始发站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站到始发站。不知不觉,我会走到东崇洞、安岩洞、新村这些大学生街。看到穿着校服的大学生来来往往,我的心里忍不住一阵难过。唉,连饭都吃不饱,跑来这儿干什么?

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了

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学时班主任曾经说过,高中毕业证比初中毕业证有用,那么,大学中途退学的话一定比高中毕业证还强些吧。要不我就考一次试试,如果考取了大学再复学,不就算是大学中途退学了么?”

在这个堂吉珂德式想法的鼓动下,我竟然真的着手准备考大学了。我报考了高丽大学商学院。考试日期迫在眉睫,我一边利用有限的时间拼命复习,一边还要到市场上帮父母干活。他们不拦着我参加考试,我已经很感激了。

离考试还有一个半月,我开始熬夜复习,用当时流行的安眠药来调节睡眠。但在临考试的前三天,我终于还是病倒了。考试那天,我勉强爬起来进了考场。不管考取与否,能够参加大学考试,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但是,我竟然考取了。

我的大学梦实现了。我成了大学中退生了。

还没高兴多久,我就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至少要上一个学期才能算大学中退啊,光是考试合格,没注册是没有用的。”

这下糟了,我去哪里找入学的费用呢?这可比考试难多了。就在我想放弃的时候,梨泰院市场的人们帮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凌晨清理垃圾。只要肯卖力地干活,交学费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每天天未亮我就开始忙活起来,把装得满满的垃圾搬到推车上,经过三角地、解放村、普光洞的岔路口,再从美军营地的右侧绕过去,把垃圾倒在指定的空地上。每天我要往返六次,上坡时累得气喘吁吁,下坡时更吃力,也更危险。

本来只打算挣够第一学期的学费,没想到靠着这份卖苦力的工作,我顺利读完了大学。

摘自《大学》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的得失既牵动人心,又涉及民利。中央领导要求不说过头话,可耳听八方,过头话还是有。过头话有形象价值,但因无法变为有益的行动,负面作用更大。

关于“充分”

说某人干了某事就“充分”体现了对什么的重视等,至少是欠确切。如果什么事都“充分”了,给以后提高执政能力、服务质量留下的空间就太少了。

关于“圆满”

把一场活动、一场会谈、一场研讨会描述为“圆满成功”作为客气话凑合,要当真就足够了。不够全面。一件事如真的“圆满”了,怕不少人

林语堂看重钱,会赚钱,在20世纪30年代的海文坛,人所共知。他拥有高收入,也是遭人诟病的一大原因。

那时,上海的文化出版业竞争很激烈,打着各种旗号的刊物,多如过江之鲫,读者买不买账,得看有没有名家撑场面。于是,名家作品是一稿难求,普通作家是数稿难发。

初闯上海滩的林语堂,倦于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想安安分分地靠爬格子吃饭,却发现这碗饭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吃饭问题成了头等大事。

穷则思变,林语堂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写一份中文的,写一份英文的,这样,可以得到两份稿费,不至于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高度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翻译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不经意间,机会终于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周越然编写的《模范英文读本》,被选入教科书,赚了不少钱。林语堂看出端倪,教科书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以当前学校对英文科的重视程度看,市场不可限量。经孙伏园接洽,

李肇星谈写文章

会面临失业的危机。如学习、研究、内政外交问题的处理等,无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关于“进步”

“进步”多见于一些官员的自我考评,主要是怕领导和群众低估自己的政绩。所以,说加强学习时得说进一步加强,谈提高认识时得说进一步提高,“加强”“深化”“扩大”等动词本来就有“进步”的含义,加上“进步”,不仅降低了这些动词的功能,还暴露出作者的个人考虑可能太多。

关于“切实”

一些人办实事下工夫不

就不“丝毫”了。

关于“始终”

有一次有人说某两个国家关系“始终友好”。这样写至少应查一下有关两国关系始于哪年,终于何时,否则恐怕难说清楚。没有调研做基础,对两国之间某段时期曾中断关系不管不顾,就套用“始终友好”的说法就好像把球射入自己的球门。

关于排比

还有人特别喜欢排比句式,不管内容是否必须,也不管是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都潇潇洒洒一口气堆砌三四个,有时就显得矫情可笑。

简朴是高雅的美。

摘自《从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录》

林语堂重钱轻财

林语堂与开明书局合作,出版《开明英文读本》。

书籍上市后,市场反应很好,一个月内,加印好几次,连带着名不见经传的开明书局也兴旺起来,推出的书,接连大卖。

林语堂趁热打铁,一连推出《开明英文法》、《英文文学读本》(上下册)、《开明英文讲义》(三册)等系列教科书。为了更好地刺激销量,他还请画家丰子恺配漫画插图。他编的书生动活泼,课文和文法结合得很紧,颇受中小学校青睐。

据林太太回忆,林语堂每年可从开明得版权费6000银元,按中国银行目前的比价,一银元等于20元人民币,也就是12万元。

林语堂初次下海,就打了一个漂亮仗,而且实惠多多。源源不断的版税,让经济窘迫的他,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文坛数一数二的富人作家。欣赏的人,赞他的是“教科书大王”;不客气的人,说他是靠教科书起家的“暴发户”。

林语堂离开《论语》编辑部,也是因为经济纠葛。

《论语》是一群意气相投的年轻人,一时玩美而创办的,有点玩票的性质。创刊期间,不管是主

编林语堂,还是撰稿人,抱着一个信念:杂志是大家说话的地方,能生存就不错了,谁也没有计较编辑费、稿费。

谁知,《论语》出埠随即大卖,邵洵美所辖的时代书店,狠狠地赚了一笔。出到第100元,林语堂找到邵洵美,直言不讳地说:“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的活,得把报酬定下来。”

后经协商,《论语》编辑部每人每月100元编辑费,稿费千字2元到3元,以时价看,算不得高。

《论语》发行量越来越大,杂七杂八的实际事务,日益繁重。林语堂忙得焦头烂额。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林语堂自认为合情合理,时代书店总经理章克标暴跳如雷,气冲冲地向邵洵美抱怨:“语堂这么搞,分明把《论语》当成自家的菜园子,重利轻义,是

一个门楣精。”邵洵美不愿插手,毕竟他是书店的老板,胳膊肘不能往外拐,他说:“你看着办吧。”

摘自《大学》

赵元任“玩学问”

“万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去作行雨,回头方丈老僧闲。”这是南宋诗僧显万的一首《庵中自题》。1947年,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应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应邀任该校教授及东方语言系主任后,他将新居定于伯克利半山腰的一座西式楼房里,好朋友胡适特意读了这首小诗赠他。赵元任生性平和幽默,如闲云野鹤,一生不问政治,只做学问。即使做学问研究,也是抱着“好玩”的宗旨。而此时的胡博士,恰为政治上的失意时期,所以“回头方丈老僧闲”,倒也颇能反映胡适对赵元任的一点羡慕之意。

赵元任先生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在语言学上,他有天才般的能力,各种方言一学就会。据说他能说三十多种方言,并

精通英、德、法、日以及西班牙语、希腊、俄罗斯等多国语言。但说来奇怪,赵元任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所修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而他对话音、音乐、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却是全凭着兴趣和觉得“好玩”获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对于赵元任的才学,胡适非常佩服,并说其“生性滑稽”,即使做学问也是如此。赵元任对于没有四声,就无法理解语音。在语音和字义的问题上,他曾写过一段著名的《施氏食狮史》,用一个音来幽默阐述他的观点。文中说:“石室诗士施氏,嗜嗜,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

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狮尸。试释是事。”

这段文字被收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短短百余字,如果光读而不看文字的话,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这也是赵元任先生幽默的性格所致,他常常喜欢用轻松幽默的方式与态度来对待学问。他在1948年的《国语入门》中,讲到语音词“吧”字时,很幽默地举例子说明不要和“王”、“问”这两个字合用。如,“问人姓时不要说:‘你姓王吧?’在请人吃鸡时,也不该说:‘请你

吃鸡吧!’”

与胡适比起来,赵元任的人生态度似乎更为轻松与潇洒。对于学问的研究,他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赵元任做学问,纯粹是为了兴趣和“好玩”,所以他写的字,是那样气定神闲,和他做学问一样,让你感觉也是在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玩”,而且“玩”得还游刃有余!他有一句名言非常有趣:对于学术,要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而对于艺术,要具有“男人对女人的爱”。

摘自《新民晚报》